

第4卷第4期 2011年11月

Vol. 4, No. 4, November 2011

国际高等教育

中东高等教育改革	133
阿曼的学术梦	135
沙特阿拉伯大学现今的形势	137
高等教育国际化：九个误解	139
韩国学生在美国	142
日本国际学生数量下降的问题	144
地震之后，日本何去何从？	146
爱尔兰：在金融危机中建设世界一流体系	148
学术期刊在非洲的可获性	151
缩短非洲高等教育的数字鸿沟	154
波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政治及人口因素	156
巴基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	159
中亚地区的质量评价国际化	161
中国的质量保障：变化的背景	164
斯洛文尼亚体制多元化的漫漫长途	166
阿富汗：行走在刀锋的边缘	168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系统的利雅得宣言	170

中东高等教育改革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中东朝气蓬勃的改革运动吹响了重振的号声, 呼吁高等教育的改革。中东各国对高等教育的抱怨层出不穷, 涉及的问题包括政府在各个层面的干涉、过度拥挤的教室、缺乏效率和反馈的行政机制、教育质量下降、课程相关度不高、师资质量差等, 其中最显著的一个问题是毕业生有学位却找不到工作。

问题

问题在于虽然新政府和学术权威的出发点是好的, 也积极承诺在学术领域做出改变, 然而大多需求却不是那么容易能实现。中东高等教育的危机涉及到整个系统, 需要重新思考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战略。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财力资源, 目前要达到所需的规模, 还不现实, 至少从短期或中期来看的确如此。

目前, 某些基本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东地区。第一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过去几十年里, 中东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急剧上升, 其中上大学的年轻人数量也显著增长。其次, 另外一个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非常普遍, 包括中东国家, 那就是高等教育的扩张程度已经超过经济体吸收高校毕业生的能力。扩大招生很容易, 而 to 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却很难。再者, 政府更倾向于让年轻人“滞留”在大学一段时间, 而不是让他们立即加入失业大军。最后一个

问题是大规模高等教育平均质量的恶化。规模扩大, 却没有资金上相应的增加。产生这种后果并不让人惊讶, 过度扩大招生自然会导致教育质量的降低。学生在教室里要找到立足之地都难, 而且大多数老师只有学士学位。

当下如何应对

对于有顽疾的高等教育系统, 没有什么快速补救措施。埃及已经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大学的去政治化。学生要求取消政府委派大学行政人员, 移除对学生选举的控制和对学生的监控, 并去除其他渗透埃及校园的政治因素。这次浪潮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通过深化学术价值, 任命致力于完善大学的官员到高校就职, 有可能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 也可以根除腐败。虽然仅靠公开宣扬大学当下正致力于深化学术价值、追求卓越、提高质量还远远不够, 但至少可以鼓舞士气。

路漫漫而远兮

不幸的是, 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可谓难上加难, 不仅需要人力、财力上的资源, 还需要有一幅路线图。可一系列政策中没有一个是容易实施的。没有政策指导的资源便毫无用处。中东国家要制定实际有效的高等教育政策着实不易。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状是普遍的。在埃及,仅仅将现有大学的招生总数提高至20万或更多是不够的,仅仅建立新大学却没有清晰的办学使命或合适的资源也是不可取的。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包括了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迥异化,将一些巨型大学拆分成小机构,推动那些数量不断增长却尚未规范管理的私有高等教育机构服务于公共服务领域,并鼓励学者取得更高的资历并向其支付合适的报酬。

由于人口众多,埃及未来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度高,因而需至少拥有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具备相当的国际竞争力,加强科研产出,为本国市场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博士研究生。

其他中东国家虽然具体情况和需要不同,却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困境

实施改革是一项挑战。主要的难题是资金问题。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有着免费或低学费的公共高等教育的传统,若是公立大学收取学费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在这样的氛围里,要想在政策上有所改变也不太可能。然而,这项策略却十分必要。因为也许除了沙特阿拉伯和部分石油储备丰富的海湾国家,其他国家要实行免费公共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因而,需要找到一些途径引入学费制度,也许可以通过结合适当贷款和助学基金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没有足够的公共资金来支持建立大规模、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东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包括提高学术专业性和建设学术文化以推进产出。除了极少数个例,中东的教学和研究质量都不高。只有少数学者有博士学位。除了沙特阿

拉伯和一些海湾国家,其他国家的高校待遇较低。公共服务部门的官僚制度、薪水过低、教学任务重以及政治压制都挫伤了学者们的积极性。需要找寻途径来建立创新型的学术文化以及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样才能吸引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到高校进行教学和科研。因此,有必要在科研项目不多的大学建立一个教学服务奖励的学术体系。

优质管理是大学有效运行的必要元素。不仅要让学者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给其以合理的报酬,还应让他们在大学管理中发挥作用。然而,这在中东却难以实现,因为政府控制和官僚文化深植于大学已好几十年。当下,学生强烈要求全面参与大学管理,而学生作为学术群体的一员,也确实应当扮演相应的角色。经验显示,最成功的大学主要由教授管理。专业的行政人员也在大学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最高效的大学是负有公众责任感、具备管理自主权的复杂体系。

最后的难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即大学和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果经济停滞,即便是优秀的毕业生也无法保证能找到工作。未就业的大学生在许多国家是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要将毕业学生的输出与可获得就业机会相匹配,这的确非常困难。教育系统能实现的最好改革便是保证优秀毕业生的教育。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系统的缺陷是导致中东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之一。重大改革显然势在必行。然而在艰难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下,要实现改革的确是个令人畏惧的挑战。首先,需制定改革的路线图。其次,要实现计划,需全社会达成一致意见。

阿曼的学术梦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阿曼, 一个只有 300 万人口的小国, 位于波斯湾一端, 如今正寻求途径努力提升其大学的水平, 使之能够加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阿曼现在正制定一项计划来实现该目标。苏丹卡布斯大学拥有 1.47 万名学生, 其中几乎一半是女生, 其先进的新式校园坐落在首都马斯喀特的郊区。自 1980 年建校以来, 苏丹卡布斯大学一直表现非凡, 学校一方认为现在可以“进阶到更高一个层面”, 并开始为这个目标做整体规划。

阿曼本身是个不平凡的地方。现在的阿曼国王, 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 (Sultan Qaboos bin Said), 十一月正在庆祝登基 40 周年。他的名字不仅作为大学校名, 还是清真寺、高速主干道等的名称。在短短 40 年间, 他让国家走出了“中世纪”。在他废黜其父王统治那年, 全国只有 3 所大学, 这也说明了前国王对任何现代事物的不信任。而如今, 阿曼人民识字率有所提高, 基础设施普遍良好, 高等教育系统不断进步, 并已出台一些启发性的、关注女性的政策。

苏丹卡布斯大学是该国唯一一所公立大学。公共高等教育其他部分由职业学院组成。阿曼选择允许私人发展高等教育。新的私立大学在建校时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包括免费的土地和面向学生的政府奖学金, 而这些大学的性质似乎介于非营利和营利之间。私立大学大多由商业企业支持, 学校全面投入运营后是否会赚取利润尚不清楚。在阿曼, 一些国外机构的分校, 提供工程和其

他某些领域的专业学位, 不过这些机构在本国却并非一流。

苏丹卡布斯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前进的道路上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 学校正致力于对教师职工“阿曼化”, 很有成效。如今, 几乎一半的师资是阿曼人, 大多在国外受过教育, 主要是在美国和英国。一旦本土化进程完成, 将只有四分之一的师资为国际人员, 这也是大学的策略之一。本土员工可被终身雇佣, 不会被辞退, 但能否保证产出成了问题。外国教职工每三年续签一次合同, 但无法取得终身任教的保障。基于科研和教学产出建设学术文化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本国员工实行终身聘用制、对外国员工实行有限期合同制、责任承担少使得工作难度大大增加。然而, 大学始终朝研究型大学发展得趋势十分重要。

地理位置也是个挑战。虽然阿曼局势稳定, 国泰民安, 各种基础设施优良, 然而毕竟不在学术圈的中心。再者, 海湾某些地区的学术产业日益繁荣, 其中包括在卡塔尔等国家大肆宣传的某些大学分校, 这对阿曼而言无疑也是挑战。在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海湾本土公立大学里, 苏丹卡布斯大学可能是最好的。然而要吸引国外的顶尖学者还很难实现。苏丹卡布斯大学开始与海外大学形成有意义的合作关系。与仅仅补助国外大学分校的举措相比, 这或许是更好的策略, 因为前者实质上对当地发展帮助不大, 甚至还可能流失许多优秀的学生和师资。

苏丹卡布斯大学目前处于未来十年目标和计划的确定阶段。然而在目标的确定上依旧不够清晰：苏丹卡布斯大学是应全力以赴成为一所成熟的研究型大学？还是应制定更

低调实际的目标？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所大学的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沙特阿拉伯大学现今的形势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沙特阿拉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不仅高度关注排名,同时也意识到本国的大学缺乏竞争力,各项排名都无法对他们的大学做出有效的评价。沙特阿拉伯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很大,目前着力于大规模扩张和加强建设高等教育,如28%的国家预算都投入到教育中。该国有24所公立大学和9所私立大学,有一部分省立师范学院和其他专科学校升级为大学。

诺拉·本特·阿卜杜拉曼公主大学(Princess Nora Bint Abdulrahman University)是沙特第一所女子大学,位于首都利雅得,拥有5.2万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新式的现代化校园正拔地而起,沙特第一条高架轻轨将连接校园各处。(沙特不允许女子开车,因而需要其他的交通工具。)虽然普遍认为女子大学在许多方面没有招收男子的大学好,但是女大学生占到全国大学入学总人数的60%。严格的性别隔离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在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很普遍。

利雅得最主要的两所公立大学分别是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和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Imam Mohammed Bin Saud University)。这两所大学目前也致力于对规模已经令人震撼的校园进行升级。其科学、技术和商业学科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还有待提高。这两所大学各自服务于超过3.5万名学生,设置了一系列完善的硕士和博士

课程。许多科学、医学和商业学科完全采用英语教学。

教育扩张已经对体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对于新建和升级的省级大学以及女子高等教育而言。利雅得升级后的女子大学将显著改善当前女子高等教育的质量。

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着高质量教授严重缺乏的难题。沙特政府通过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项目针对海外硕、博士项目提供10万个奖学金,几乎所有获得奖学金的沙特学生学成后都会回国。许多奖学金被授予有希望在获得学位之后从事学术工作的优秀研究生。然而,要填补师资空缺还需要一些时间。政府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城市大学的教授就职于省内,如大幅度涨薪,然而却没有多少人接受。

学术生涯结构有许多附加问题。大多数学者一旦被聘用,便终身任职,而薪水的增加与产出没有多大关联。这样一来,学校便缺乏对高产出的刺激。再者,即便是在那些致力于提高科研声誉的大学,老师的教学任务也很繁重,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科研。大量的“近亲繁殖”(inbreeding)出现在沙特的大学里,许多老师都是同一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获得过海外奖学金,继而在职位上晋升。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沙特的校长们和政策制定者们近期齐聚利雅得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沙特人对其大学在国

际排名中曝光率不高有所不满，然而也认识到他们的大学大多新建不久，并在许多方面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他们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并不是每所大学都有望成为研究型大学，以及采取何种措施来实现大学使命中核心的教学、社会参与以及其他功能。一个引人注意的想法是，沙特大学或许可以在其他领域而非研究领域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尽管研究是最容易被衡量的。校长们讨论了在“世界一流大学体系”中，各所大学的使命应当差异化。同时，虽然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奖励。特定的大学应对其使命进行明确的定义，并在这些

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应认识到不是所有大学都有望成为研究型大学。应减少对国际排名的强调，考虑到沙特社会的复杂需求，这也许是件好事。大学可以根据地区需要对自己进行定义，而具有至高权力的高等教育部也会帮助保证该国的每所大学都具备合理的使命。

沙特的学术领袖和政府领导十分重视并认真思考学术发展的策略。因而，沙特的大学如何在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同时，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需要，这标志着一个学术体系正在成熟。

高等教育国际化：九个误解

Hans de Wit

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化领域教授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以英语作为教育语言

长期以来,英语是主要的研究交流语言。过去20年里,高等教育领域倾向于采用英语而非本国语言进行教学。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随之产生。渐渐地,英语教育和国际化之间被画上等号,导致对其他语言关注的减少。由于缺少对英语非母语学生和教师英语水平的关心,从而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

留学或居住海外

海外留学或实习经历已被列入国内学习的一部分,通常被认为等同于国际化。尤其是欧洲委员会刺激迁移的政策使得这种国际化手段在过去25年里十分风靡。然而,这种不平衡、极简化的迁移是否能称得上是国际化,这一点值得质疑。再者,迁移可以说仅仅是促进国际化的手段而已,本身并不是目标。需要适当地将迁移这一概念嵌入到教育的国际化中。需要确定的是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过去20年里是否从边缘化的兴趣点发展为核心焦点——即主流国际化。不容置疑,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全球化加深了竞争和市场化进程对国际化实现方式上的影响。国际化把许多动机和途径加以区分。主流国际化假定了一种更为完整的、基于途径的途径,旨在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增强老师和学生的素质。然而,虽然国际化在高等教育

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现实却没有这么乐观。活动导向性或功利性的途径依旧占有很大优势,这导致对国际化发展本质的误解。这里将描述九个误解其中的两个。与简·奈特发表于《国际高等教育》2011年冬季刊第62期上的《国际化的五大谜题》一文中提及的一个谜题不谋而合,借以说明国际化被认为是一种旨在推动国际化进程的有纲领、有组织的特定策略——换句话说,国际化的手段似乎已经成为目标。

附加值可以在学生之间产生,因而需要思考其它更具创意的方法来获得这些附加值,例如通过采用远程教育或虚拟交流。

国际化学科

始终存在的第三个误解是认为国际化就是提供具有国际内容或涵义的课程,如欧洲研究、国际贸易、环球音乐等。在提供这些项目的机构和学校中,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都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实现国际化。并非又一次忽略这些项目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只是这种方法太过简化和手段化,就好比把区域研究称为国际化。

招收许多国际学生

第四个误解是假定拥有许多国际学生便是符合国际化的趋势。不可否认,将本地学生和外国学生聚集在同一间教室学习确实能

对国际化作出极大的贡献，然而仅仅拥有国际学生是远远不够的。不幸的是，无数例子表明许多学校专门为国际学生开设项目，将国际学生分离为孤立群体。

较少的国际学生就能保证成功

对前一个误解的反驳观点同样普遍存在。特别是许多国际项目招收的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数量比例极不均衡。部分原因是国内和国际上对于国际学生的生源竞争愈发激烈，导致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比例日益失衡。因而，一间只有寥寥几位国际学生的教室很难称得上是国际环境。

相反，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主流非英语项目的国际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不管动机是否强烈，对国际教育有所兴趣的本地学生都希望能进入国际项目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对采用本国语言教学的主流教育的兴趣逐渐减弱。再者，这些项目中，国际学生为数不多，容易产生矛盾。当教室里只有一名或两名国际学生，究竟要不要用英语授课呢？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数量如此悬殊，如何才能使国际学生融入其中呢？

没有必要测试跨文化能力

第六个误解假设正常情况下，学生只要在国外学习、实习或参加国际课程的学习，便能具备跨文化和国际交流能力。这个误解和前面提到的有关迁移、以英语作为教育语言和国际学生招收数量的问题紧密相关。如果这些活动和手段被认为等同于国际化，那么很明显可以假设学生能获得跨文化和国际能力。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这些活动就能带来的结果无法保证。毕竟，学生们完全可能孤立自己，拒绝和留学国当地学生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分享经验和进行交流。

越多合作，越国际化

第七个有关国际化的误解是对合作关系的过分强调：更多的合作伙伴能带来国际化的成功。全球化、竞争、市场化进程推动了战略合作的发展。战略合作的发展趋势通常表明了意图。然而，大多数合作伙伴只保持双边关系。在某些大学和学院，合作伙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交换的学生和老师的数量。

高等教育一本质上就是国际化的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大学和其研究者具备国际化的特征，因而没有必要刻意刺激和引导国际化。比如，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伊拉兹马斯（Erasmus）生活的时代（公元后1467~1563年），欧洲交换项目便是以伊拉兹马斯命名。但是，这样的历史参照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多数大学起源于十八和十九世纪，具有明确的国家导向性和功能性。国际化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在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中，而是需要引进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被广泛接受的、由简·奈特（Jane Knight）提出的定义中，国际化被形容为一个整合的过程。

将国际化作为明确的目标

前面提到的许多误解都是将国际化等同于某种活动或手段。最后一个，也是最普遍的一个误解是将国际化当作一个重要目标，因而这个误解和前面的误解性质相一致。国际化是一个将跨文化、国际的和全球的元素和维度引入高等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致力于改善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和实践的过程；从而也是一个提高教育和研究质量的过程。如果国际化被当作某个特定的目标，那么它仍将停留在临时的、边缘化的层面。

要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挑战和机遇，必须认识到这些误解依旧十分常见。

作者著：本文节选自作者于2011年4月6日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开演讲。

韩国学生在美国

Hanna Kim

美国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文学硕士

电子邮箱: hana2617@gmail.com

韩国热衷于将本科学生送到海外接受教育, 这在全球都是有名的。事实上, 韩国学生在美国是第三大留学生群体。因为许多美国大学在世界排名中表现优异, 因而韩国人对美国大学学位的认可度很高。对教育背景的强调使得接受过美国教育的职位申请者在招聘中具备很大的优势。因此, 韩国父母鼓励自己的孩子将常青藤联校作为自己求学的主要目标。韩国大型企业也经常采用特定的现场招聘和雇用策略来吸引常青藤联校毕业的学生。再者, 韩国社会的某些特点, 包括对潮流的敏感性和对持有海外学位者的偏向, 使得留学海外被认为是必须的。

本文主要研究韩国学生选择留学海外的驱动力、日益增加的归国韩国留学生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美国大学提升留学生教育方面的建议。另外一项分析则主要关注韩国留学生在获得美国学士学位回到祖国后所取得成功的经历(该项分析部分基于访谈)。

韩国国内背景

韩国学生选择到美国留学是因为他们想要学习英语。在韩国, 私立教育的成本日益增加, 美国学位的持有者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项研究调查询问了 1055 名韩国人, 让他们指出哪个国家是他们最想去的留学目的地, 结果显示美国排名第一。韩国人跟随潮流的倾向、英语日益明显的重要性和以往留学美国的韩国学生所拥有的特权地位都可

以解释这项排名的结果。

韩国社会对潮流非常敏感, 韩国人也紧跟大势。1994 年到 2006 年这段时期被称为“青年留学浪潮”, 数以千计的韩国学生奔赴美国学习英语。而且许多韩国公司将熟练掌握英语作为招聘要求之一。此外, 1993 年, 金泳三总统将全球化作为韩国的首要任务。2000 年, 政府取消对学生留学海外的限制。因此, 韩国留学生数量从 2000 年的 45685 名增加到 2010 年的 75321 名, 增长了 36.6%。几乎 40% 的韩国中学生都选择到美国留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只有少数来自韩国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出国念书, 而成为一名留学美国的国际学生所带来地位效应几乎保证了这些学生在韩国可以任意选择一家公司工作。目睹这一切, 中产阶级父母也开始视美国学位为一项投资, 对美国高等教育能够保证他们的孩子在韩国取得成功满怀信心。然而, 由于越来越多的韩国学生出国留学, 归国的学生正逐渐失去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他们在韩国的就业机会也受到了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提供了什么

在美国取得学位使韩国学生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互动。由于韩国人口组成比较单一, 然而越来越多的韩国公司变得全球化, 多文化背景的毕业生在韩国招聘市场上倍受青睐。对韩国公司而言, 国际学生的最大优势表现在他们流利的英文、全球化

的视角、多文化的经历、创造力和灵活的思维。刚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毕业的杨小姐说道，“在韩国，大家都认为美国教育培养了创造力和自信心，因为整个课堂环境允许自由讨论，鼓励学生在作业中运用灵活的思考。”

由于韩国公司继续将他们的生意扩张到其他国家，相比其它资质和能力，与外国人共事的经验更受青睐。已获取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学士学位的金先生说道，“（在韩国）公司最看重与外国人沟通的工作经验，而这是留学美国的韩国留学生的专长所在”。因而，学生们通常也会选择那些可以提供工作经验给留学生的大学。

大多数留学海外的被访者后悔当初大多数时间里只和韩国朋友打交道，只选择那些不要求作报告、没有当堂论文测验和课堂讨论的课程。许多学生也不知道大学的职业中心可以为找工作和选专业提供相关信息和支

持。再者，学生们觉得很难脱离自己的“适宜地带”（comfort zone，即安逸的心灵空间）并与美国学生进行交流。因而，学校如何集中资源来帮助学生从美国高等教育中获得最大的益处至关重要。此外，应当鼓励学生参与有助于训练批判性思考的课堂讨论，更多地与美国学生沟通交流，并从职业中心寻求职业发展上的服务。这样的过程能帮助韩国留学生充分利用美国教育的经历，并最终使他们在韩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今，韩国的青年面临高失业率，归国的学生人数越多，他们要找到工作就越不容易。而且国内学生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所以，在美国求学的韩国学生必须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大学也应该实施一些项目来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实现其职业目标。同时，父母们还会继续将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期待美国教育能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个人和专业机会。

日本国际学生数量下降的问题

Yukiko Shimmi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 shimmi@bc.edu

日本国际学生都去了哪里?根据国际教育协会的《门户开放报告》(The Open Doors Report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美留学的日本学生数量在2009~2010年间下降了15.1%,只有29264名。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关注。尽管各日本媒体对此现象表示忧虑,但是数名日本大学和教育机构的专家认为日本年轻人对留学海外的向往依旧不减。

专家们对导致下降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探索——人口组成变化、国内大学实力的提升、经济停滞、日本大学生求职季以及学术要求等,还就当下新趋势和提高留学人数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下降模式

日本社会的人口组成转变通常被认为是造成日本国际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据日本政府统计,在1996年20~29岁年龄群人口数最高达到1900万,而201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400万。日本政府对引起日本出生率下降的多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如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有所增加;日本的工作模式通常要求加班,使得分配给家庭的时间减少;经济稳健度不高的年轻工作者数量增加等。实际上,这样的人口组成变化是造成当下出国留学的日本学生数量减少的潜在原因。日本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使国内可招收人数增加,导致出国的日本学生减少。从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国内招生人数增长主要集中在四年制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就读国内学校的经济成本不会很高。因此,国内的大学在此期间录取了较大规模的日本本国学生,出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相继减少。

经济因素也是日本留学生数量下降的影响因素之一。由于美国大学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使得愈来愈少的日本学生选择美国。另外,非英语国家大学提供英语课程的现象日益增多,以及非传统留学目的国学校提供的教育项目日益增多,这些非美国大学提供的教育项目时限相对较短,学费相对较低。

就业系统和求职时间问题是影响日本本科生选择出国的另一因素。传统上,日本大学生的求职季开始于大三的秋季。许多留学国外的学生希望自己在找工作的时间上不落后于国内学生。海外学习的经历和美国学位并非总能为留学生回到日本就业带来优势。相反,如果归国的学生不能调整自身以适应日本的社会规则,这些经历反倒会被雇主当作负面影响。

学术上的要求也对想要进入知名大学的日本学生造成了困难。尤其是托福考试网考的新系统(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对日本学生来说似乎是个不小的挑战。该系统包括口语测试部分,根据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2009年日本学生托福考试成绩在30个亚洲国家中排名第27位。

新趋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的教育学家认为日本学生对国内研究生院和学年制大学本科的兴趣依旧保持稳定。同时，数名大学和教育机构的海外留学顾问观察到当今大学生虽然受到和上一代相同的出国导向的影响，然而他们更关心出国学习的成本、风险和产出等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国际学生人数总体下降趋势中，在美国学习非学位教育项目的学生人数却在上升。日本政府报告显示，在美国留学的日本学生人数稳定上升（虽然2008年有轻微下降），根据大学交换协议，人数从2001年的4513名上升到2008年的6403名。参加短期学习或交换项目可能是满足学生出国学习愿望的可行方法。

为了支持这股新潮流，日本政府为三个月以内的交换项目设置了奖学金。一流的大学也开始为学生赴海外参加短期项目提供出发前的必要支持。日本教育学家认为这些短期项目的参与者们之后应该会参加更长期限的海外学习项目。

再者，更早的为学生提供相关信息是另外一种支持的方法。有些信息提供者不仅面

向高中生，而且面向父母和教师提供留学信息。有些大学强调对大学新生的入学教育。这些努力都旨在让学生不拘泥于常规教学模式，提早开始计划海外学习的事宜——不仅考虑求职问题，也要考虑更好的准备托福考试和学术资格考试等。

近期企业招聘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日本学生对出国学习的态度造成不小的影响。为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数家日本公司称他们看重国际经验和外语能力。一些公司也非常注重招聘具备这些能力的非日本籍学生。由于就业仍旧是日本学生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因而招聘政策上的这项变化可能会鼓励更多的日本学生出国学习。

近期在美国的日本留学生数量的下降引起了日本国内广泛的讨论。尽管许多政府领导和产业界领导希望更多学生具备国际经验，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取得先机，日本学生却倾向于更现实地考虑教育成本、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等问题。虽然许多因素导致出国学生数量减少，然而日本公司招聘政策的变化，加上短期海外项目获得的大力支持，可能会使出国学习的学生数量有所上升。

地震之后，日本何去何从？

Kazuko Suematsu

日本东北大学 (Tohoku University) 经济管理研究生院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电子邮箱: suematsu@econ.tohoku.ac.jp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级地震，这场浩劫使日本陷入一片混乱。据称有1.5万名日本公民丧生，1万名失踪，12万名因家园被毁暂住在避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约在2000~3000亿美元之间，这使得正处于发展中的日本东北地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余震不断，再加上对可能造成巨大灾难的福岛核电站的恐惧，受灾地区的群众在悲痛之余也感到十分焦虑。

地震对日本高等教育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由于“全球30万国际学生计划” (the Plan for 3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支持，即日本欲在2020年之前吸引30万国际留学生赴日学习，日本的高等教育产业正处在国际化进程中。此计划的第一阶段，即“全球30计划”(Global 30)，政府投资了41亿日元以资助13所重点大学领跑整个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在“全球30计划”之前，另外一项5年计划，即在日国际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项目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已经着手开展，其内容包括向国际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全面的商业培训和实习工作机会等。虽然，之前日本大学在国际化速度上可能落后于邻国，然而到2011年3月11日为止，他们始终一步步埋头朝前赶进。

地震带来的负面影响

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当前和未来国际学生数量的减少。东北大学是日本东北地区

最大的学校，34名在校国际学生在地震发生后撤离日本。81名本科交换学生中有44名放弃在日学习，43名中有33名计划4月重新开始学习，三分之一的秋季申请者取消了赴东北大学的海外学习计划。

流失的学生数量虽然只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的10%。然而流失人数将继续增加，因为地震对于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远在福岛核电站以南350英里、位于京都的大学。国际学生的持续减少给“全球30计划”带来了严峻挑战，同时给原计划到2015年国际学生数量达到3千名的东北大学带来冲击。

吸取教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地震其实给日本创造了一个评估本国国际化水平的机会。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月，一系列事件引起对东北大学国际化成果的质疑。首先，风险管理标准应该制定得更高一些。东北地区早在十多年前就预测将发生大地震，既然有许多国际学生是来自非地震带国家，东北大学应将地震方面的信息放到入学教育中，或是向学生发放当地政府制作的防震手册。

大学一开始将学生聚集在校园中指定的撤退区域，而学生在解散时却没有得到任何清晰的指导，学校也没有说明接下来该怎么做，因而国际学生只能自己想办法抵达避难所。

第二，大学应更加积极地收集准确信息，

并及时向国际学生传达。独自在陌生避难所的学生们得不到有关地震和核电站事故的状态更新，来自非官方信息源的消息会让他们变得十分脆弱、不安。他们的父母和朋友也焦虑万分，对现状的了解只能依靠本国媒体的报道，因而他们就会催促学生立即撤离日本。

而且，一封群发邮件也促使学生离开日本。据说一封发自中国政府的电子邮件让中国学生到离东北大学所在地仙台 200 英里远的新泻机场集合，乘坐政府包机离开日本。超过 100 名学生奔至新泻机场，许多学生为买到一张汽车票，排起了长队，有些甚至拼车前往，分摊 800 美元的出租车费。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政府包机存在。那些无力支付全额票价的学生住进了机场附近的避难所，直至中国领事馆的代表前来营救。

同样，国际学生同国内学生以及日本公民相比，在面对地震的反应上大相径庭。如果大学及时向国际学生提供相关信息，帮助他们做出合理的决定，就可以避免他们因盲目恐慌而逃离日本。

应对挑战

尽管大学对这场大地震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但校方对于错误及时做出了反应。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修改了网上申请系统，为交换学生建立了一个安全确认的网页。国际学生在该网页上可以报告、更新他们的安全信息、活动状态甚至是学习计划。据悉至 3 月 28 日，东北大学近 1000 名学生和三分之二的国际学生，已经安全撤离。到 4 月 25 日，有 86% 的学生表示愿意在新学年开始之前返回日本。

日本政府也出面提供支持，对获得政府奖学金的归国学生提供免费返日机票，并对就读于灾区大学的自费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

世界各地的合作学校也相继伸出援助之手，增加交换项目配额并接受日本学生参与交换项目、为受灾者募集资金、发来慰问并鼓励日本人民。校友们积极捐款，帮助学校修复损坏的建筑物。地震提供给日本一个机会，去发现自身复原的力量，去发现全世界有这么多朋友向日本伸出援手。

爱尔兰：在金融危机中建设世界一流体系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工业大学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副校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爱尔兰不是唯一经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国家，金融危机给国家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困难。爱尔兰也不是唯一经历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性转变的国家，其公共资金也遭遇大幅度削减。据欧洲大学协会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监测，高等教育公共资金削减最厉害的国家分别是拉脱维亚 (2009 年减少 48%，2010 年减少 18%)、意大利 (预计到 2013 年将减少 20%)、希腊 (计划减少 30%) 和英国 (预计到 2014 或 2015 年将减少 40%)。冰岛预计在 2011 年减少 6~7%，2010 年减少 5%，而爱沙尼亚自 2009 年就面临 17% 的资金削减。相比，北欧国家、法国和德国由于学生数量上升和资金增多，投入高等教育的资金减少幅度相对不大。

2011 年 2 月的爱尔兰大选中，在过去 79 年里执政长达 61 年的共和党竞选失败，其被指责在经济上管理不善。在当前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中，高等教育无疑成为受害者之一，因而民众对于竞选上台的基督教党 (Christian) 和民主党联合政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在对待高等教育时能更为仁慈。

1998~2008 年间，又被称为“凯尔特虎”时期，爱尔兰高等教育受益颇多，在政策议程上也高居要位。当时，核心预算大幅增加，其中超过 30 亿欧元投入到高等教育研究和设施建设上。入学率从十年前的 44% 上升到今天的 55%，2020 年的目标是达到 72%。然

而，如今爱尔兰只将国民生产总值 (公有和私有) 的 1.2% 花费在高等教育上，远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平均水平。财政部资助占高等教育资助的 85%，而 OECD 的平均比例是 73%。如果不算科研资助，生均经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国家低了 15.5%，如果算上科研资助，则要低出 28%。

自 2008 年起，高等教育在核心资助中的比例总体下降 17%。预算和学生数量各自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而每名学生所获得的资源比高等教育总体经费削减得更为厉害，从最初每名学生高达近 10000 欧元的投入下降至不到 3000 欧元。预计到 2014 年，就业率将下降 7%，而近年来薪资水平已经下降了 5~8%，并且所有新岗位的起薪也都下降了 10%。因此，已有数据表示那些最初被爱尔兰以高工资和高福利吸引来的人才中出现了流失的迹象。

政府试图保留研发资金，这可能会成为其新雇佣策略的关键部分。这部分资金在 2009~2010 年期间下降近 30%，而在 2011 年又有所回升，不过各机构和项目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资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应用型研究的资助上，2011 年此部分资金增加了 12.5%，着重强调商业化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进行的重点研究投入政策更是巩固了这一趋势。

体制层面的变化

在对目前新环境的清晰认识下，“2030年高等教育国家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于2011年1月启动。合理、有效被确认为主要的发展目标，不再是仅仅关注体系重建的产出。令人憧憬的是，通过资源配置，当下这场危机让体系得以重塑，并更具竞争力。要想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依旧保持教育质量，这着实是个挑战。

爱尔兰有400万人口，其高等教育通常被描述为二元体系，有7所大学、14所技术学院、9所教育学院、国家艺术与设计学院、2所非国家资助的私立学院以及一些小型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机构的联盟或合并引起极大关注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有一小部分人附和赞成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和都柏林大学（the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指定为世界一流大学，对其加以优待，不过还没有书面上的表达。事实上，目前“世界一流大学”的字眼只出现在一些大学排名中，除此以外并未出现在其他地方。相反，焦点被放在教育体系的质量上，许多建议都倡导关注对体系连贯性、统一性和机构多样化的需求。

两个目标分别是合理化各类大学机构的数量和提高整体效率。为形成国家特别指定的理工大学，政府鼓励某些技术学院合并。将来，高等教育体系可能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少数研究型大学，一定数量的地区大学和一到两所专攻某些领域的理工大学，以及一系列主要由技术学院组成的教育机构。同时，也鼓励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合作教育机构区域群”（其中包括大学、技术学院和其他教育项目提供者），以此向共同的战略目

标迈进，并共享后台服务（包括渠道、信息技术支持和电子图书设备等）。

为保证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坚持实践办学使命和整个体系的合理差异化，高等教育局（政府缓冲机构）和各大学机构之间需要进行一系列战略对话。通过这样的过程，双方做事的步调可以取得一致，政府也会提供援助。

另外一个讨论热点是学费。学费在90年代中期被取消，旨在扩大招生，然而预算赤字将这项议题重新摆在桌面上。尽管学费只能覆盖高等教育费用的很少一部分，国家在策略上还是偏向于提高每名学生的学费。至今，前政府和现政府对该提议都是犹豫不决，这也难怪：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任何有关毕业税或以收入为基础的学生贷款制度的限制性条款都起不了作用，并且已有将近25%的毕业生选择移居国外。

学校层面的影响

其实早在经济衰退之前，学校层面的变化便不可避免，因为学校所面临的大环境以及面对变化所表现的适应速度都对其决策力和执行力提出了研究的考验。院系合并，项目变更，一些特别课程也中止了。许多由战略资金或目标资金资助的社教项目和非核心项目如今也受到威胁。技术学院正经历着双重打击，一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二是新的资助模式的实施，该模式早在数年前就公布而到如今才正式引入。

在国家的协调下，技术学院的教师员工同意调整工作量。然而，由于所有教师是终身任职，学院很难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如废除整个院系或取消项目）。这就意味着那些兼职或短期合同员工和预算中不支付报酬的这部分员工受到的影响最大。

小国所面临的挑战

经济危机和持续衰退使爱尔兰陷入重重困难。爱尔兰的许多改变大体上与其他国家所推行的保持一致，比如强化政策调控和管理，全面重建体系。不过爱尔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整个国家策略”(a whole of country strategy)的强调，而不只是仅仅建设几所世

界一流大学。爱尔兰想要通过打造以国家为整体的单个质量品牌来加强其全球竞争力，例如，“爱尔兰品牌”(brand Ireland)。国家策略将所有涉及教学、科研的高等教育机构都考虑在内，让每一所学校都去寻求和打造自己独特的全球领导力。

学术期刊在非洲的可获性

Jonathan Harle

英国英联邦高校协会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 研究员

电子邮箱: j.harle@acu.ac.uk

做研究需要一系列最新的学术信息, 例如书籍、期刊和数据, 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学长期面临着这方面的挑战。学术界经常谈论道, 对于学者们工作和发表论文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获得同行研究成果的途径。有些研究者辛辛苦苦完成一篇论文打算提交, 却发现去年有类似的论文已经发表, 或是他们没能成功获得重要的最新论断和数据。过去十年里, 人们做出许多努力试图解决这样一个信息鸿沟的问题。事实上, 英联邦高校协会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实际前景要比预期光明得多。

空荡荡的书架和胀鼓鼓的数据库

许多用户感叹大学图书馆书架都是空荡荡的, 但是他们往往忘记了网络上提供给学者和学生们的海量信息。纸质印刷物向电子出版物的转变, 也促使相关的印刷和运输费用减少, 这就使得一些针对低收入国家的项目发展起来: 较为知名的有联合国为卫生、农业、环境期刊推动的“健康研究在线计划”(Health InterNetwork Access to Research Initiative)、“全球农业研究在线计划”(Access to Global Online Research in Agriculture)、“环境研究在线计划”(Online Access to Research in the Environment)、旨在强化信息的“科学出版物项目的国际网络计划”(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Program for the

Enhancement of Information), 还有图书馆的电子信息以及其它一系列规模较小的计划。目前网络上可获取的信息资源十分丰富。经协商, 单单“科学出版物项目的国际网络计划”就收录了超过 2.3 万本各领域全文期刊, 而“健康研究在线计划”收录的期刊数超过 7500 本, “全球农业研究在线计划”收录了超过 1900 本期刊, “环境研究在线计划”收录了 2990 多本期刊。开放接入的期刊数量不断增加: 开放接入期刊目录共收录 6317 本。图书馆员也始终致力于保证这些内容的可获取度。书籍方面依旧存在较大空缺。然而, 自从网上电子书籍出现后, 按需印刷逐渐增加, 当地出版社也有所壮大。根据这些趋势可以做出乐观的预测。

期刊的可获性

通过比较内罗毕、达雷斯萨拉姆、马拉维、卢旺达的大学的期刊收集情况, 可以看出汤姆森路透社排名靠前的一些期刊的获得性还是非常好的。事实上, 79% 排名前 20 的期刊都可以获得, 覆盖了 15 个学科领域。某些领域的配额比其他领域高, 其中农业、生物、材料科学、人类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期刊论文的可获得率超过 90%, 而数学学科的这个比例只有 25%。

当然, 汤姆森路透社的评估并不十分完美。它过分强调欧美的期刊, 而排除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刊物。事实上, 这些

刊物可能收录与非洲地区紧密相关的论文。相似地,每个领域仅仅选取20种期刊就好比只展露冰山一角。然而,如果此种可获得性能够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不再是首要问题。非洲大学并不比其同行落后多少。不过两所欧洲大学的文献获得率达95%,相比依然更具优势。

信息连通性

技术落后被普遍认为是获取资源的主要障碍。非洲的大学不像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拥有同样的网络连接和先进的电脑设备,他们要支付比发达国家教育机构更多的费用来获取同样的资源。不过,如今已有许多显著的改进。新建成的海底电缆为非洲东海岸带来了高速宽带,西海岸海底电缆也正在建设中。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开始覆盖该地区,同时投资建设地面上的基础设施以减少成本。

尽管需求大大超过供给,但是电脑设备也有所改善。在参与这项研究的四所大学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但是为学生提供电脑设备则依然是个问题。虽然有成千上万篇期刊可以获得,学生却必须排队(有时还需要付费)才能进入拥挤的计算机机房,因而能够获取文献的机会并不大。然而,除基础设施的问题以外,“电子化准备程度”(e-readiness)似乎是个更大的挑战。因此,大学需要改变态度并改进技术。

意识和技能

既然可获性良好,技术也稳步提升,那究竟是什么造成学术界无法获得所需的研究成果呢?一个主要阻碍可能是基本意识的缺乏。学者和研究生的文献目录所列出的文献大多十分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然而,其中72%

的文章目前已经被订阅。可见当图书馆员努力和用户沟通时,信息的传递上显然缺乏贯通。部分原因是路径的复杂性,即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藏库、档案和备份文件。另一原因是在图书馆员根据学科或研究课题来归档文件时,缺乏对他们的定向支持。在线收藏中,论文往往与其来源出版物分离,这意味着有些学者对他们研究领域主要期刊的认识还不够。

当代研究者需要具备的一项关键技能是在线搜索技巧,但是这项技巧不仅仅只是在谷歌搜索栏里打字。在电脑屏幕上,搜索结果只显示了简化的搜索策略,这就导致许多高质量、被同行评审过的内容和订阅不为人所知。

组织上的障碍

尽管文献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和个人技能,不过良好的组织动力也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我们交流过的教师反映,许多系所其实很少涉及研究。教学任务繁重,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教师通过夜校授课或较多的咨询工作等赚取额外薪水,这些诱惑不但占用了学者们大量的时间,还腐蚀了研究文化。况且,这些事并不需要用到多少学术期刊。

图书馆内和馆外也存在深层次的组织结构上的挑战,其中包括图书馆和学术系所的脱节、图书馆员的地位不高、图书馆和信息技术系所间的关系不紧密,以上都成为挑战的一部分。

图书馆同时也要需提高其员工的技能、自信以及主动性。比如,信息技术应当在研究方法课程的授课内容中应该占更大的比重,图书馆员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图书馆的实力依赖于他们与学术人员的联系。同样,

研究和教学的实力也反过来依赖于图书馆的质量。

作者注：此报告全文请访问
http://www.acu.ac.uk/growing_knowledge。

缩短非洲高等教育的数字鸿沟

Anna Bon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U University Amsterdam)国际合作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电子邮箱: a.bon@cis.vu.nl

过去几十年里,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给高等教育和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类信息杰作,即万维网的兴起,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教学和学习中的运用,都促进了新的互动型动态学习方法的发展,也有利于跨文化合作交流。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基础组成部分,是信息和沟通的渠道,是促进创新的工具。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中的瓶颈

目前,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学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部署上落后于其他洲的大学。这些非洲大学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物理设施存在各种各样的技术劣势,如网络宽带不够、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短缺、能源供应不稳定、信息安全度差以及缺乏对终端用户的技术支持。显而易见,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急需改善。

过去几年里,非洲大学做出许多努力来缩短数字鸿沟,比如建设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物理设施和实施信息系统。其经常在外界资助的项目支持下,建立校园网络并配备电脑。学校安装了学生信息系统,并开通网络连接。然而,与教学相关的主要挑战是建立合适的研究设施并为非洲输送高水平的专家。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遇

非洲大学需要良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首先,信息和通信技术是远程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这被认为是非洲的头等大事。有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的远程教育在非洲也被认为是扩大教育覆盖面的有效手段。此外,远程教育还可以减低招生成本,并鼓励学生入学,特别是对女性和偏远地区的居民而言。

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提升研究实力也十分必要。尽管各项高等教育政策鼓励科学研究,非洲大学的学术发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科研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信息和通信网络技术可以提供途径并促进非洲大学参与到国际研究组织中,促进论文发表和复合性知识创新。

非洲需要通过好的教育项目向劳动力市场输送高水平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目前,非洲有许多私立信息和通信技术学院,培养输送网络专家和系统管理员,这些都是技术职业层面的重要专业人士。然而,非洲依旧需要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家,来填补工业和社会里高端职位的空缺,并加强非洲本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后者之所以必不可缺,是因为目前“数字鸿沟”所带来的难题只能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来加以解决。

重重挑战

许多非洲大学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上的技术劣势通常是由一些外界因素导致的。事实上,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及维护所产生的高额花费对于长期缺少预算的非洲大学而言的确是个挑战。另一个阻碍信息和通信技术在高等教育中普及的外界因素是技术人员出现“人才流失”,这是因为大学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

得到赞助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项目,一般也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投资,这些也只能暂时解决设备短缺的问题,却无法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此外,这些项目过多地强调信息系统和虚拟学习环境的技术实现,而不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工具在本土环境中的应用。

尽管有许多外界因素对信息和通信技术构成阻碍,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以及打造机构的创新文化和氛围,以期提高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大学运用的质量。

改善建议和创新

毋庸置疑,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机构层面的管理必须得到改进。顶级的管理者需要明白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机构中的重要角色,并密切关注服务输出、项目管理和机构文化。他们必须意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引进会改变机构文化。终端用户、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部门、高层管理之间的开放式对话对于机构改革和创新应用进程至关重要。

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有关信息和通信技

术如何适应非洲本土环境的研究对于非洲高等教育十分关键。一个基于非洲具体情况例子是近期移动电话在非洲盛行。这一现象创造了机会,使得低阅读率和低收入人群也可以学习和分享移动通信方面的新技能和知识。一些研究课题,如“Web 2.0”工具在农村发展中的应用、农村社区中移动学习和知识分享,都是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并基于非洲具体情况的研究课题。

基于非洲具体情况的一个实用研究方案案例是“活动实验室”(the Living Labs)概念的产生和应用。该概念将用户合作开发的系统方法应用到新产品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产品的研发中。此概念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利用集体智慧和群体活动,这样可以产生“流动想法”(travelling ideas)的再创造和应用。在南非,活动实验室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例如非洲信息与交流技术高等研究院(the Meraka Institute)。这个概念很快将传播到非洲的其他研究团队。

如果非洲大学要成功扮演社会创新者的角色,那么就必须促进科研教育中创新氛围的繁荣。思想引领者在推广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法一夜之间实现,需要时间。非洲大学需转型为学习型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知识不再是静态的,而是与活动紧密相连的,并能为知识传递和知识共建创造理想的条件。在这种环境下,思想引领者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研究者,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要比获得技术方案重要的多。

波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政治及人口因素

Marek Kwiek

波兰波兹兰大学 (Poznan University)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教授及主任

电子邮箱: kwiekm@amu.edu.pl

近20年来,波兰需求导向型增长的私立高等教育构成全球化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部分。波兰是欧盟第六大教育体系,拥有190万学生;同时私立学校学生录取数量在2009年为63.3万学生,录取率为33.3%,居欧盟首位。经过近20年的不断发展后,私立高等教育在2009年录取率下滑了10%,2010年进一步下滑。在新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采取干预措施,预计在未来10年内将削减私立及公立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以此确保学术生存;国家补贴的设立也将出于相同目的。

需求导向型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欧洲东部和中部出现了首批私立机构,当时的高等教育政策重心是教育扩招。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即所谓“非公立”机构,在波兰及欧洲其他地区迅速增长;但是当时质量保证及认证系统的发展相当有限。1990至2009年间,波兰拥有330家私立教育机构,中欧和东欧一共约700家。这种扩招与鼓励外部私有化和内部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其中,外部私有化指新的私有化教育提供者的出现;而内部私有化指实行收费制,兼职研究,名义上免费,或以税收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的出现。波兰学生数量迅猛增长,1990年学生人数为40万人;到1995年,数量翻倍至79.5万人;到90年代末,学生数量又翻两番,至2000年达160

万人。本世纪初,尽管新型私立机构仍在大幅增长(2009年达330家),但是扩招幅度却开始大大减缓。在教育扩招期间,政府无干涉、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都是关键问题。私立学校学生越来越多,约有30%到40%的公立学校员工同时在私立学校任职,这些人多数能保障中产阶级水平的的生活。但是,在后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大学教师工资相比其他职业则少之又少。

不断变化的人口分布

现如今,人口因素似乎在改变一切,或许有必要进行政治介入。私立学校扩招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因此,面对未来10年学生数量即将锐减的状况,私立高等教育正在努力找寻生存出路。当今,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为主、为波兰制定的人口发展战略预计:到2022年学生数量将是2008年学生数的55~60%;至2022年,报考学生人数将由2008年的49万人降至26万人。如果所有学生进入以税收为经费支持基础的公立大学求学,那么收费制的私立学校又该何去何从呢?学生怎会放弃传统意义上依靠税收、免费的、并且更有名气的公立学校,退而选择相对缺乏社会合法性且需付费的私立学校呢?

新型生存战略

问题的出路可能在于实施既符合市场人

力需求同时有较高社会认可度的高质量教育。但是，由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和宽松管理，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没有多大竞争性。约5~10%的私立大学这样的少数特例影响不大，但须特别注意。因此，现在私立大学开始寻求政治干预，并希望获得政府补助。中欧的私立机构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为“独立型”私立教育机构（independent private），与“依靠政府型”私立教育机构（government-dependent private）相对立。也就是说，“独立型”私立机构不依靠政府补助，而是基本上依靠收取学费来维持学校运营。迄今为止，波兰的所有私立教育机构基本上完全依靠收费来维持经济运转，2009年其收入90%来源于收费，仅1.8%来源于科研。

面临着公众信任度低、未来10年学生数将锐减50~80%、学校唯一职责为育人并且获取公共科研基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等种种难题，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又该如何应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试图向政治家寻求公众支持，同时探讨新的生存战略。由于人口现在不可变更，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希望能够重新定义国家政策。在学生数量激增的年代，私立部门独立于政府之外至关重要。只要学生愿意付钱，文凭工厂遍布全国各地，全职教工在私立机构几乎不存在，许多机构甚至对教育质量毫不关心。

公众对在公立学校试行收取学生费用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政府对私立教育机构进行补助的可能性依然不明确，但是在2011年2月内阁表示愿意向私立教育机构敞开公立基金的大门。具体指私立高等学校所有全日制学生11万人，约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所有学生的17%，可能得到政府补助。这尽管是一小步，但具有长远意义，甚至将重新定义国家教育政策。

对私立学校的评估

但是，在向私立学校开通公共基金（并非同时面对公立及私立学校的研究经费）之前，政府将对其20年的运作进行评估。其对社会、经济乃至整个教育体系贡献值是多少？其毕业生在人才市场的受欢迎度如何？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对增加高等教育平等入学机会有何贡献不可否认：在私立学校的学习机会，或在公立学校中收费制的非全日制项目的学习机会，为社会中下阶层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因此，波兰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活跃在人力市场拥有高等教育证书的人从2003年的256万增长至2009年的431万，即从人力资源的15.35%增长至24.7%。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公立学校职员同时受聘于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科研名誉也逐渐受到损伤。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中欧地区，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科研强度弱、国际视野缺乏，有可能与允许教师在私立学校“学术兼差”的政策定义和学术标准有关。

结语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可能缩水的私立高等机构为了生存，或许会通过多种途径向政府寻求补助。“跨部门”竞争（intersectoral competition）和“公立垄断”（public remonopolization）等高等教育方面的模糊概念可能在公众争论中越来越多被提及。如果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全日制学生的补助得以实行，这将是私立学校踏上通往公共基金长路的第一步。

波兰最近的高等教育改革普遍受到欢迎，博弈的规则发生根本性转变。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20年历史被完全评估之前，高等

教育改革还不应该实行通过私立机构获得政府资助的政策。波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成长,以及将来可能的消退或依赖公共补助的存活,或许能为世界上其他处于困难时期的地区,即那些人口增长下降、私立学校几乎

全部依靠收取学费生存的地区,提供发展模式上的借鉴。未来尚无定论:在未来10年中,人口因素和政治因素都将扮演重要角色。人口因素可以预测,而政治因素无从猜测。

巴基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

Nelofer Halai

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迦汗大学(Aga Khan University)教育发展中心(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副教授

电子邮箱: nelofer.halai@aku.edu

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催生了大量的私立大学。例如,印度和中国为私立大学开放了越来越大的空间,这些大学可以独立发展或者通过与公立机构合作、与国际机构合作发展。然而,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在建的私立大学都质量低下,巴基斯坦也不例外。

国家推动

巴基斯坦的私立大学教育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阿迦汗大学1983年获得特许建立,是巴基斯坦的第一所私立大学。1985年建立的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是第二所。私立大学的起步很晚,但是截至2000年已经有10所,现在则增加到60所。而巴基斯坦现有70多所公立大学,公立大学的在校人数只占全部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的四分之一。倘若那些私立大学能在扩大入学机会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将会对巴基斯坦的人力资源发展发挥主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焦点放在扩招上,对于教育质量的关注是不足的。

大学扩招

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数目持续增加,也不断扩招学生。2002年,为了改善和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巴基斯坦成立了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这个组织记录了高等教育增长的数据。从2002~2009年,在学人数从27.5万人变成80

万人,增加了两倍。其中包括了私立大学在校人数11.5万人。过去的五年间,18~23岁的适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翻了一番,从2.2%上升到4.7%。这与2010年达到5%的计划已经十分接近,而巴基斯坦的长远目标是将这一比例提高到10%以上。即使是这样迅猛的扩招速度仍然不足以达到目标和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据估计,2010年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容纳130万学生。

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委员会于2006年推出了巴基斯坦大学排名。这份排名显示,私立大学的高等教育质量很差。尽管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和阿迦汗大学在商科、信息技术和健康科学的分科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它们只是特例。根据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评估,私立大学在所有五个方面都问题重重,只能提供低质量的教育体验。私立大学尤其需要对师资队伍和研究产出方面给予特别重视。这两方面的缺损会让私立大学被视为鼓励死记硬背通过考试拿学位的机构,而不是为学生提供智力成长的大学。由于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标准没有严格执行,建立私立大学相对容易,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今日这样的局面。

市场导向

私立大学主要是在市场需求大、所需资源不多的领域进行投入,这是意料之中的。私

立大学对职业教育的市场需求反应灵敏，却在其它领域的国家需求上不够灵敏。例如，巴基斯坦现有的社会科学糟透了，需要强大的社会科学教育。但似乎这方面话题所受的关注度几乎为零。

昂贵的私立教育

私立高等教育相当昂贵。巴基斯坦的平均国民年收入是 370 美元，但普通硕士教育的年学费至少为 1000~1500 美元。很明显，这种花费不是普通的巴基斯坦人能够承受得起的。为了让无力付费的学生也能上学，私立大学需要设置一个透明、灵活的财政资助项目。

私立学校

私立高等教育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办的学校很浪费，效率低下，雇用的教师不能胜任。相比之下，私立大学更有效率，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最终将能和国际大学竞争。私立学校被描绘成通过民间投资扩大了入学机会并提高了教育质量的

系统。然而，私立学校也制造了“教育的种族隔离”(educational apartheid)：那些有经济条件的学生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没有条件的只能被迫进入低质量的公办学校接受低质量的教育。

慈善机构或教育信托机构建立的私立学校却是例外。这些学校已经能够以合理的收费标准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同样，以利他主义而不是营利企业为基础建立的大学已经能够坚持标准。因此，鼓励这种家族信托基金或慈善组织建立私立大学可能会对扩大入学机会并保证质量有益。

展望

因此，巴基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中除了少数特例以外，整体上质量较低。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政府更积极的介入，如实施严格的质量保障措施。倘若政府政策同时鼓励提高质量和扩大入学机会，私立大学就能够照办。

中亚地区的质量评价国际化

Martha C. Merrill、Shakhnoza Yakubova、Zhazira Turlanbekova

Martha C. Merrill: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Kent State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学副教授
电子邮件: mmerril@kent.edu

Shakhnoza Yakubova: 哈萨克斯坦管理和战略研究中心 (the Kazakhstan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Research) 主任
电子邮件: syakubov@kent.edu

Zhazira Turlanbekova: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
电子邮件: zturlanb@kent.edu

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开启了质量评价国际化的进程,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却没有。其中的差别在于政治纲领(即对构建内部和外部都透明的国家领导体制的意愿)和经济状况(即资助教育改革和对抗不合适的“教育出口”的能力),而不是教育质量。质量评价意味着需要弄清谁需要获得质量保障。透明的评价程序是为学生、基金会和潜在的合作者提供大学质量保障的第一步。

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发展阻力

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古尔班古力·拜尔德穆罕默多夫 (Gurganbuly Berdymukhammedov) 更希望该国的学生和教授免受外界影响。2009年和2010年,该国对有意出国留学的学生关闭了国门,不允许他们出国留学,即使是美国一些大学在中亚的分校。虽然到2011年3月该国开始承认外国学位,但是之前2月时,政府仍然强制要求学生和教师遵守新的规定。然而,2011年4月,媒体报道又说回国过暑假的学生可能不能再出国了。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被高度政治化。由外界来进行公正评估,这在目前是不可想象的。

相较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则非常积极地广泛参与欧盟资助的教育项目,并办了三个国际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在该国的“跨欧洲大学交流计划”(Trans-European Mobility Sche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网站上公开表示了参与博洛尼亚进程进行改革的意愿。然而,高等教育依然深受政府控制,乌兹别克斯坦不可能按照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障标准指南的要求建立一个非政府的评价机构。更不用说接受国际专业机构或欧洲质量保障名录(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上所列机构的评价了。

塔吉克斯坦是前苏联国家中最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政治领袖不鼓励其它理念,在中东乱局开始之前,家长们就已经被要求把孩子从其他伊斯兰国家召回国。塔吉克斯坦唯一的一个私立大学定期接到关门的威胁。塔吉克斯坦对于高等教育只有有限的财政支持能力,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引入外部评价的能力也相当有限。

吉尔吉斯斯坦: 复杂局面和“KASHA”

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很复杂。该国4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不过该国也是WTO在中亚的唯一成员国。该国针对《关贸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中相关教育服务和所规定的五个教育部门中的四个, 已经承诺向 WTO 组织的成员国开放其国内教育市场。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政治最不稳定同时也是最国际化、最开放的国家。该国大学包含俄罗斯、土耳其、科威特、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阿加汗基金会以及土耳其苏非派等在此建立的大学, 还有中亚美国大学(与巴德学院一起授予双学位)、俄罗斯七所大学的分校以及两所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医学院, 这些大学面向所有中亚国家招生。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学课程由两种组织形式, 一种是学时制, 一种是学分制, 有时同一学校有两种课程; 大学中可以授予苏联模式的毕业文凭和博士学位, 也授予一般的博士学位、欧式的三年制学士学位, 以及美式的四年制学士学位、一年和两年制硕士学位。当地的教育界称这一系统为一锅“粥”(kasha, 即当地俚语), “一团糟”。吉尔吉斯斯坦积极地参与到索罗斯基金、欧盟基金和美国国际发展基金的相关项目, 还将博洛尼亚进程的各个中心设立成全国性的网络。该国还用“跨欧洲大学教育交流项目”(Trans-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me for University Studies) 基金在 13 所大学的 11 个学科发展了“谐音计划”(Tuning Project)。

然而, 欧洲谐音计划所建立的假设基础, 并非与适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假设一致, 这些假设中包括将雇主和校友的观点融入到大学课程改革的能力等。类似的, 2007 年教育部、索罗斯基金和教育网络联盟(Education Network Association) 联合出台的《吉尔吉斯共和国高校质量内部保障组织手册》(the Manual for Organizing an Internal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Kyrgyz Republic) 也引发众议。尽管谐音计划以设计和履行学习目标为重

点, 但是欧洲质量管理基金会这种模式还是更强调商业功能, 对学习评价很少关注。另一个外部资助的项目是跨欧洲大学教育交流项目, 这个计划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建立中亚质量保障和认证网络, 举办有用的论坛; 然而这个项目的影响很有限。

2009 年 8 月, 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表示有意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改革, 并参加了 2009 年 4 月在鲁文拉讷举办的第一次博洛尼亚政策论坛。不过,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这个欧洲质量评价程序远没有 2008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艾米·科勒·拉兹伯格(Amy Kirle Lezberg) 撰写的一份针对教育认证的报告名气大。2011 年 3 月, 美国国际开发署还赞助了一个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地区举办的有关认证和评价的论坛。

哈萨克斯坦: 博洛尼亚改革和外部评价

哈萨克斯坦一独立就开始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从 1991~2000 年, 土耳其、俄罗斯、美国、德国、英国以及阿加汗基金会等纷纷在该国建立大学。1992 年, 许多用英语教学的大学开张, 如哈萨克斯坦经济管理和战略研究院(the Kazakhst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Strategic Research) 等。以哈萨克斯坦总统名字命名的巴耶夫大学(Nazarbayev University) 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并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开始招生。

2004 年, 哈萨克斯坦开设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2007 年, 《教育法》确立了这一体制。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大学在欧洲和美国寻找双学位合作伙伴。该国前任教育部长占赛特·推门巴耶夫(Zhanseit Tuimenbayev) 多次将国际专业认证列为重要目标, 而直到 2005

年哈萨克斯坦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认证程序, 2008年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际质量保障署。哈萨克斯坦的首份《博洛尼亚进程国家报告》(Bologna Process National Report)称, 10所大学在2009年通过了国际质量保障署的认证。相对于2008年来说, 当时国际质量保障署对60所大学进行了排名, 但只有6所大学通过了认证。然而, 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大学都向国际中介机构寻求专业认证, 这些中介机构包括德国科学与工程认证署(the Germ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ccrediting Agency)、德国拜罗伊特学校认证和质量保障中心(the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Institute from Bayreuth)、工程技术专业认证委员会(the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和商学院本科学院促进委员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等。德国拜罗伊特学校认证和质量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称, 该中心已经对哈萨克斯坦的6所大学进行了评价。2008年, 工程技术专业认证委员会则对哈萨克国立技术大学的冶金工程专业进行了认证。

尽管哈萨克斯坦已经于2010年3月被纳入博洛尼亚进程, 但是许多教育界人士可能还

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要求。例如, 《2011~2020年教育发展国家计划》(the State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2011~2020)中的《国家资格证书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看上去更像苏联模式的, 但是相关博洛尼亚对所有层级的学位持有者规定的技能要求并没有多少体现。

前进步伐参差不齐

在整个中亚, 质量评价的国际化步伐很不一致,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政治立场和财力而不是教育需求。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不希望接受外界监督。塔吉克斯坦则太贫穷、国家局势也太不稳定, 因而不能以财力修补和承受改革可能引起的损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样贫穷和不稳定, 似乎愿意接受捐赠人的资助。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稳定, 也是签署博洛尼亚进程的国家, 自诩为中亚地区质量评价最为国际化的区域。然而, 自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今年2011年4月获得95%的选票继任总统之后, 观察家们可能会质疑大学排名和国家评价的决定因素。即使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透明的评价过程仍然不是常态。

中国的质量保障：变化的背景

Kathryn Mohr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国际事务学院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教授

电子邮箱: kmohrman@asu.edu

过去30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已经发展出一个更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中国政府结合美国的认证体制和欧洲的“远距离控制”来做质量保障,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

背景

整个体制的发展主要由五个因素导致,其中主要因素是大众化。但是,由于资金资助的增长速度不能与招生人数的增长同步,生均资助减少了,质量也随之降低。本科教学被忽视;新的教师评价标准以研究产出为重点,鼓励教授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发表著述上。早期的评价方案需要大学承担监管责任(regulatory burden)。然而,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大学被授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尽管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资助水平和招生配额等方面有更多的利益关系,但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最终选择将其质量保障体系与欧洲和美国接轨。

政策实施

从2003年开始,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套本科教育评价指标,包括学校使命、学术资源、教学发展和学习结果。教育部已经对约600所大学进行了五年一周期的本科教学评估。

评价的过程汲取了欧洲和美国的评价制

度的经验。大学首先要提供一个自评报告,对照教育部的指标体系阐述自己的教学条件、管理实践、优势和弱势。本科生每学期都要对每门课程进行教学评价,这已经被列为大学自评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评估信息和评估结果并未用于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而只是停留在满足评估要求的层面。

评价的第二步是进校考察,又称现场评估。结束后专家组需要对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份报告。与美国高校评估体系不同的是,中国高校的自评报告、访问团报告和最终报告未必是机密文件;教育部正计划将来能够把这些报告发布在教育部网站上。

以第一个五年评价的经验为基础,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正在发生变化,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部和大学之间积极沟通的例子。例如,对所有学校的评估都按照统一标准,但是很明显,大型研究型大学和小型技术学院不应该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评价。因此,教育部创造了一个多级体制,其中学校使命和特殊性都被考虑在内。

类似的,批评的声音聚焦在指标的选用上,认为指标不合适或太模糊。为了应对这些批评,教育部将指标定义得更清晰、更具体,并且要求最后的评估报告应该从最初的高度定量慢慢转向定性的报告方式。此外,为了给大学提供评价指导,教育部还提供了—些教育改进、师资发展、校园建设等做得好的学校案例。

舞弊和贪污是这一评估体制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质量保障过程中牵涉巨大的利益关系，因而大学通过伪造数据以避免资助和招生名额的减少。教育部已经指示评估人员警惕可疑的统计数据；教育部还计划建立自己的基本数据统计系统，以此减轻对大学提供数据的依赖。另外，一些大学为访问团提供昂贵的礼物和薪金并精心款待，教育部对这种铺张浪费和行贿受贿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定。

公众也对超过80%的大学能获得“优秀”评价（2007年）提出了质疑。批评者还担心大学只尽全力应对五年一次的评估，而不能将质量保障体系真正嵌入大学管理机制。

总的来说，质量保障进程已经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高校对本科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现在全职教授都被期待定期为本科生上课。大学也正在向图书馆、实验室、教室、师资建设和其它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此外，大学也已经越来越重视围绕本科课程制订战略规划，因此，做得最好的大学被授予了更大的自治权。由于对本科课程质量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现存的许多问题已经慢慢得到改善，如改革创新的教学方法、发展学生的创造力、设置更多跨学科的学习等。在现有成功的基础上，质量保障体系的实施正要被拓展到研究生教育层面。

2010年11月，教育部宣布建立“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机构协作会”。这个协作会有200多个成员高校，该组织与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络（the Europe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和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定位一致。

发展前景

中国政府无疑正在从教育提供者向教育规范者、促进者和协调者转变。不过，批评者认为，教育部的控制仍然太强。质量保障体系要求大学自身要实施改革，但目前大学的自治权仍然受到限制。莫家豪等学者将其描述为“集权的分权化”（centralized decentralization），即分权化也就是将战略发展进行“再集权化”（recentralization）。莫家豪也认为，当前的政策转变强化而不是削弱了政府的角色。

一些有趣的反例的确是存在的。2010年，三个大学联盟成立，并单方面宣布在配合高考的同时自主管理联盟的自主招生考试。大学在录取时将考虑学生的两种考试分数。尽管这好像只是大学之间的招生竞争，但也被认为是无视教育部的指示而在质量保障的自治权方面的直接行动。

这一体制将继续在中国演变。最近的政策声明，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了教育质量保障对于达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市场化的结构将继续鼓励非政府来源的高等教育投资，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这些投资来源主要包括家庭、学生和民营企业等。

作者注：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英杰教授和李旭对本文背后的长篇文章做出的贡献。

斯洛文尼亚体制多元化的漫漫长途

Manja Klemenčič、Janja Komljenovič

Manja Klemenčič: 独立研究者、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manja.klemencic@gmail.com

Janja Komljenovič: 斯洛文尼亚高等教育与科技部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卢布尔雅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教育政策专业博士生

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多样化被视为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弱点。一国高等教育体制多元化可以达到两个主要目的: 面对不断增长的入学学生数, 高等教育体制多元化能够改善学生入学机会公平问题; 同时, 大学也能在专业领域追求卓越。这一观点主张, 即使是在欧洲的一些大国, 一个国家也负担不起同时发展并维持几个功能趋同和范围同当的世界一流大学。此外, 由于学生数量不断增多、生源不断多元化, 每个国家也需要多种多样的大学来满足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 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元化需要相继体现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公共服务和其他方面。当大家认可高等教育需要发展多元化后, 如何从机制上达成这个目标就成为争论的焦点。赞成体制多元化的政府必须通过公共资助机制支持“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实践证明, 积极的财政刺激(“胡萝卜”)在政治上更行得通, 因而与消极的财政措施(“大棒”)相比更容易实施。本文所描述的斯洛文尼亚的情况就是如此。

缺乏多元化

斯洛文尼亚于 1991 年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 人口 200 万, 国土面积 2.073 万平方公里, 与英国威尔士或美国新泽西州的面积相似。该国有 3 所国立大学, 包括中部的卢布尔雅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东北部的马里博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ribor) 以及西南部的普利莫斯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rimorska); 有两所大学组成的大学联盟, 即诺瓦·格里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va Gorica) 和欧洲地中海大学 (Euro-Mediterranean University); 以及 30 所其它类型的高校。

三所国立大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比如卢布尔雅那大学历史最悠久, 在校生数比其它两所学校多一倍, 也是唯一一所艺术研究院的大学。然而, 如果不考虑规模和历史, 三者之间在功能上几乎没有分别。它们都在努力成为研究型大学, 提供完整的课程体系; 虽然学生的地域来源分布不会有不同, 但是它们都试图录取同类学生。每所大学的目标都是成为综合性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非大学的高校也希望最终升级成为大学。此外, 不同高校的同一年级则常提供相似的或者同样的课程和教学方式, 并面向全部学生, 而不考虑区分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最后, 斯洛文尼亚缺乏一个二元的高等教育体制。无论是大学还是自治学院, 都倾向于为学生同时提供学术和职业培训两方面的本科课程。这些大学还在不同区域建立了分校, 同时提供学术和职业培训两方面的本科课程。

到目前为止, 为了应对公众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 斯洛文尼亚主要通过建立新大学, 包括一些非国立大学, 并同时开办

分校，来发展高等教育多元化。换句话说，多元化发展主要是扩张式的而不是简化式的。

处于政治优势地位的多元化

斯洛文尼亚高等教育与科技部新发布的《高等教育规划 2011~2020 年》(the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2011~2020) 将大学多元化放在仅次于国际化、质量和社会规模的重要地位，这四者是国家教育体制发展的主要支柱。在多元化方面，高等教育与科技部提出了两个计划。其一是打造明显的“劳动力多样化”，建立研究型大学和高等职业学校的二元体制。因此，将会新建技术大学，并且/或者合并已有的职业学校。

其二是提倡大学品牌化，特别是大学提供的课程内容和定位的高度多样化。为了达成这一点，规划提出修改现有的拨款体制，允许大学就实现多样化与政府协商具体的拨款额度。在基本额度之上，大学应该能够就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申请额外拨款，额外拨款可以达到基本额度的 20%。规划指出，经费将按照质量评价、量化评分和国际同行评议的结果以及大学和政府的协商情况进行分配。发展性经费的具体拨款标准目前仍很模糊，该规划的后续规定将涉及这方面。不过，按照规划，具体的拨款标准将分四个主要发展支柱，即多元化、国际化、质量和社会规

模。规划的制定者期望大学能明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将投入聚焦于自身独特的优先事项，从而确立教育品牌形象。可以预见，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质量保障署 (Slovenian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将会扮演重要角色，该机构负责该国所有高校和课程项目的认证。在下一轮周期性认证中，该机构将能够按照多元化战略监控大学。

最后，规划还提出为高校开放更多招生上的自由，目的是让课程定位和学生选拔更加一致。目前，本科招生以全国性的考试为基础。大学没有也不能发展自己的入学标准。该规划强调，新的学生选拔方案必须在保证入学机会公平的同时，按照课程的定位要求为大学选拔最合适、最有学习动机的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

会有效吗？

其它欧洲国家的政府为了防范高校出现平均主义 (egalitarianism)，故而实施了“胡萝卜”战略，其中以德国卓越计划最为著名，这或许能为高校多元化发展释放积极的信号。与之相似的竞争机制也能在斯洛文尼亚起效。然而，考虑到斯洛文尼亚的国家规模小，以及战略目标之间的结合，该国新的拨款机制很可能会同时涉及扩张式逻辑，即奖励卓越的措施，以及简化式逻辑，即通过淘汰较弱表现而树立品牌形象的措施。

阿富汗：行走在刀锋的边缘

Fred M. Hayward

独立的高等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haywardfred@hotmail.com

现今阿富汗国内的战争背景，很容易让人忽视该国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进步。然而，该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正处在刀锋的边缘。政府和捐赠者的大力支持可能将其推向好的发展方向，即质量改进、有规划的扩张以及为其坚实发展所提供的。另一个则可能由于其深陷无限增长需求、低标准和腐败的环境中而踟蹰不前。

阿富汗的高等教育曾是地区领袖，但30多年的战争使其沦为该地区最落后的国家。入学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2.43万降低到2001年的7800人。由于塔利班政府排斥女性，学校里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女教师。一半以上的教师逃亡了，一些人被杀或者被捕，一些高校被关闭。几乎每个校园都遭到损坏。一些校园断水断电，许多实验室不再运行。当时喀布尔大学（Kabul University）是一个教课的军事基地。其教学质量下滑，许多毕业生不再能满足雇主的需求。

而从2001年开始，高等教育部开始运作，修复和改进基础设施：新建和升级了一些工程、信息通讯技术、药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实验室；新建了教室和宿舍，尽管缺口仍很大。约500名阿富汗人被送出国接受博士和硕士教育，现在已经有60多人回国教学。然而，截止2010年，仅有8%的教师有博士学位、32%的教师持有硕士学位，其它60%仅有学士学位。过去五年间，学生人数增加了40%，现在的学生数为6.38万。参加当地

入学考试（又称Kankor）的学生中，仅有一半人能进入高校深造。在过去几年中，前高等教育部长和副部长试图清理了招生中的腐败问题、重建了高等教育部的诚信，并重新确立了全国入学考试的合法性。

高等教育体制遭受过度集权化的痛苦。由于所有赚来的经费必须上交国库，而且退还的钱数也相当少，因而大学对于践行创业活动没有积极性。高等教育部长目前致力于在财政和管理上去集权化，但是在过去两年中议会的立法功能几近瘫痪。

高等教育部和大学领导人们一起努力，已经为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做好了准备。领导者现在已经意识到课程内容的升级、教学方法的改进以及以解决问题和讨论来替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能力迫在眉睫。新规定强调了以绩效为基础的招聘和升职制度，并在数十年间首次对教师研究提供资助。

高等教育战略规划

2009年，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磋商，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规划2010~2014年》（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10~2014），该规划得到广泛认可。该规划的两个首要目标是质量改善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进。质量改善强调师资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升级、课程修订以及建立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计划。每年潜在的高中毕业生有50万人，但是严重缺乏

经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因此,到2015年,增加入学机会对于满足国家的人才需求十分重要。规划的目标是将入学人数从6.2万增加到2014年的11.5万人,并鼓励高质量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

高等教育部已经开始增加女性教师和学生数量。女学生的比例从2001年的0增加到今年的19.3%。不过,女性入学仍然受到女生宿舍数量有限等问题的阻碍;只有25%的高校毕业生是女性;并且在阿富汗的一些地区仍存在反对女性接受教育的观念。高等教育部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建立更多的女生宿舍。女教师的比例已经从零增加到2010年的15%。政府的努力受到的阻碍因素包括高等教育系统中女性数量的缺乏、阻止许多女性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社会环境、阿富汗国内硕士教育项目的有限(仅6个)以及整体上对博士教育的缺乏。

主要的挑战

尽管进步不小,但挑战仍然很严峻。目前,规划所需要的5600万美元只有10%到位,其中大部分出自世界银行。尽管捐赠人支持这个战略规划,但真正募集到的钱很少。尽

管领导层决心要改变,但实施的过程令人气馁。老一代教师尤其惧怕变革。政治和其他压力阻碍着招生、招聘和升职的绩效系统,矛盾不断。只有少数几位国家领袖意识到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类似的,许多学生和家的首要兴趣是工作,很少关心知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生提出了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他们担心接触不到前沿知识、最新的课本以及缺乏师资力量。许多领导人决心提高质量并让高等教育与阿富汗的国家需求联系在一起。他们看到阿富汗的工作机会正被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地的毕业生占据,因为本地的毕业生缺乏必要的训练。

在阿富汗,高等教育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转折点。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可以把目光放长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学习文化以及为一个更开放更有竞争力的民主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创造条件。问题在于,当前对转型的开放是否能得到捐赠者和其他相关人士的支持,在撤离阿富汗之际他们是否会错失为阿富汗年轻人的未来留下一笔遗产的机会。

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系统的利雅得宣言

本文源自2011年4月19~20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会议。宣言由会议的督导委员会起稿，沙特阿拉伯高等教育部也有参与。该宣言旨在为有关21世纪一流高等教育的相关争论抛砖引玉。

高等教育对于一国参与全球知识经济至关重要。大学为21世纪的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对个人而言，高等教育对于求职和流动也至关重要。对社会而言，大学是研究、分析和评论的丰富来源。高等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生态中占据中心地位。建立并持续发展高等教育系统，以期服务于社会需求、满足个人企求是每个国家的核心任务。

知识生态必须推动知识转移：无论是传统知识还是现代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全球知识还是本土知识，都要从研究转移到实践运用中，再从实践运用转移到研究中来。知识生态必须增进知识，并支持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知识生态必须传承历史、改革当下并构建未来。知识生态必须维护知识、利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知识生态也必须发挥知识的力量。

在这个信息和全球竞争无处不在的时代，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是知识经济中本土知识生态的引擎。这一系统应该深入知识环境的方方面面：吸收全球知识并将其本土化；寻求本土知识并将其全球化；发现新的知识并将其融入全球知识生态。因此，这一系统应该支持将最优秀的全球知识用在解决本土问题上，支持用全球最好的思想提出解决本土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在知识之风全球劲吹的同时又不抹去地区特色，从而催化思想创新。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应该同时走出去

和引进来。它应该能为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提供机会，同时也不忽视那些因为地理、距离和其它因素被否决和剥夺了机会的人民。它的大学应该多元化，既是全球顶尖的、独特的，又是本土开放的、宽容的，能让所有人接触到卓越品质，使命虽各有不同，但同时又在增进国家福祉上有共同的动力。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应该让研究、教学、服务和发展和谐共处。尽管一些大学可能会特别重视其中的某一个方面，但是一流大学作为一个群体应该在每个方面都有兼顾。在研究上追求卓越常常凌驾于一切，研究得好不好也是最容易评价的。尽管单个大学可能在研究或其他方面有特长，但在整个系统中，教学、服务和发展必须和研究一样受到同等对待，它们四个是一个整体。对大学系统的评判要全面，要看它对知识生态、经济以及人才成长和培养所做的贡献。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推动社会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而不是大学的全球排名。

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必须包容人文和科学学科，有专业教育也有职业教育，有相关的哲学教育也有实践教育。它必须拥有知识生态和知识经济的思想、躯体和灵魂。一些学科的活动可能会有很高的社会能见度，另一些则不那么显眼；一些学科的成果可能是有形的，而另一些可能是无形的；一些学科的努力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另一些可能是长期的；一些学科的贡献可能是明确确的，

而另一些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以下方面都应该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的一部分：(1) 教育下一代拥有公民精神、领导力，并帮助他们为知识经济做准备；(2) 增进广大学生的入学机会以提高社会流动性；(3) 支持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做贡献的研究；(4) 支持能够促进知识创新的基础研究；(5) 解释、批评和保护社会的文化遗产；(6) 成为讨论和分析的平台。

因此，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系统是复杂的也是多元化的。它拥有各种各样的学术机构，所有机构都要对知识生态做贡献。一般来说，一个国立大学系统包含少数几个提供研究生学位和专业学位、录取顶尖学生的研究型大学，较多的能够提供本科学位、以教学为导向的大学，以及一些位于底层的、一般不提供本科学位的高等职业学校。这几个部分之

间需要协调和沟通以服务于不同的需求。

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谨慎地协调资源，关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和目标，要有大局观，而不是只看排名榜单。发展一流大学需要视野宽广、目标一致，并在建立可持续的知识生态上有特色，反过来这也会帮助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系统还要求系统能够通过适当的绩效评估和质量保障措施来评价学术体制的效率，以保证系统的各个层面能成功发挥作用。质量保障是一件难事，因为需要评价的学术责任是多种多样的。此外，学术工作的许多重要方面不容易评价，比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果等。

我们致力于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系统的多元性，使其能够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并将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联结起来。

